

劳动参与率理论发展综述*

张 雄

(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劳动参与率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状况。什么决定劳动参与率?经济学者们从个人或家庭等角度出发,先后提出各种理论予以解释,包括工资(率)变动、家庭时间分配、减税政策、理性预期等。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也逐步增强。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工作;闲暇;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4-0036-04

Review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ZHANG Xiong

(Population Research Center, Guizho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reflexes the degree of labor force of a regio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meanwhile, reflexes the dynamic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hat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depends on is explained by economists by all kinds of theories from the angle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including wage change rate, family time arrangement, tax-cut policy, 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so 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the reality explanation by theor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Key word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work; leisure; theoretical review

劳动参与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全体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总数占该国(或地区)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是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状况。由于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在的联系,激发经济学家探究影响劳动参与率高低的各种因素,并由此形成了各种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与工资变动的解释

对于影响劳动供给变动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论述。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工资理论。他认为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资就会超过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

以上;然而工资的增加也会鼓励工人生儿育女,造成劳动力供给增多;而随着劳动力供给增多,工资又会下降到它的最低水平。斯密将劳动者看作财富的创造者。提高劳动者工资,会刺激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

在工资与劳动供给变动关系方面,李嘉图首先将劳动的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即劳动力价值)和市场价格(即工人出卖劳动获得的工资)。他认为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在他看来,工人人口增加快慢是随着工资的高低而变化的,而工人人数增减又会引起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结果就会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因此他认为工人人数的增减是工人工资变动的

* 收稿日期:2007-05-20

作者简介:张雄(1982—),男,湖北武汉人,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

关于劳动供给变动,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述有很大区别,前者认为工资变动导致劳动供给变化,后者则认为劳动供给变动导致工资变动。根据劳动力需求理论,工资变动和工人人数变动都是导致劳动供给变动的因素。两者虽然结论不同,其实殊途同归。在此基础上,罗宾斯(Robbins,1930)建立了简单的模型。

二、早期劳动参与率理论,罗宾斯的贡献

现代劳动供给理论始于罗宾斯(Robbins,1930)。他建立如下公式: $Y = W \cdot L$ (Y :收入; W :工资率; L :工作时间)。由上式不难推出,收入变化率等于工资率变化率加上劳动时间变化率: $y = w + l$ (用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各自变化率)。将上式两边同除以 l 可得: $y/l = w/l + 1$ 。

罗宾斯把 y/l 看作收入需求弹性,若此值大于1,那 w 和 l 必然有同号,即随着工资率的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会有相同方向。通俗的解释为:随着单位时间工资数量的增加,人们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罗宾斯给出收入价格的定义,他认为收入价格单位用时间来表示,它是工资的倒数。故工资率越高,要取得一个单位收入所花费时间越少,即努力程度越低。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把工资变化划分为收入和替代效应,但他明确地指出了实际工资率变化所引起的工时数的变动迹象模糊不清的原因,为后人在这方面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提出

在罗宾斯以后的30年中填补此理论空白的是所谓“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一种工作时数与工资率之间的逆向联系。从所观察到的工资与工作时数之间的负向联系[道格拉斯(Douglas),1934;杜兰德(Duland),1948;朗(Long),1958]中,人们得出工资变化的负的收入效应倾向于超过正的替代效应的推论,即随着工资增长到一定程度,人们趋向减少工作时间,个人劳动供给曲线在到达某点之后向后弯曲。对此,Killingsworth进行了一项彻底的分性别经验考察,得出结论:“男性劳动供给曲线在工资率提高时向后轻微弯曲;女性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则有较大递增。”在对9个实证研究进行仔细考察之后,Borjas和Heckman估计,工资率提高10%将使男性劳动供给量减少大约1%-2%。Keeley的估计表明,工资率提高10%使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约10%。

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的明显差异,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时间除了用

于市场工作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给家庭工作。后弯劳动供给曲线解释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使得经济学家转换研究视角,从家庭的角度解释个人劳动供给决策。

四、加里·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关于家庭劳动参与率理论

虽然工作-闲暇模型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于理解工作-闲暇决策和有关这一决策的含义是有用的。贝克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该模型做了推广和拓展,形成时间分配模型,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贝克尔将家庭作为研究出发点,他把家庭看作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出产生效用的“商品”,这些产生效用的商品由家庭把物品与时间要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来。家庭将其支配时间用于三个基本方面:(1)在劳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货币收入来购买物品和服务(劳动市场时间);(2)用于家庭生产(家庭生产时间);(3)用于物品和服务的消费(消费时间)。

此外,贝克尔将商品分为时间密集型(包含大量时间和少量物品)和物品密集型(需要大量物品和少量时间),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生产商品的时间和物品可以互相替代。

在分析家庭成员分配其时间方面,贝克尔运用比较优势原理,个人应该专门从事比较效率最大(或机会成本最小)的工作。在分配可用时间上,家庭应对每一成员在生产商品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市场和非市场劳动生产效率做出比较:某一个家庭成员在某项劳动中比其他家庭成员更有效率或更熟练,那么他用于这项劳动的时间就应该更多。

基于贝克尔模型的收入效应,工资率提高使收入增加,从而使家庭可以购买更多物品,由于消费这些物品需要时间,工作时间因而减少;替代效应为工资率提高将使工作时间增加,是因为家庭以物品替代了商品生产中花费的时间和在消费上以物品密集型商品替代了时间密集型商品。

五、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解释

关于“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实证研究,揭示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随工资率的增长而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朗(1958)观察到,尽管家庭实际收入存在着长期增长,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连续增加的矛盾。他试图通过诸如生育率下降、家庭器具日益增长等原因来解释,但他没有试图去区分劳动力供给效应和替代效应。

明塞尔将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重点放在“家庭”这一背景下,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行为必然受到家庭当中孩子的存在、数量以及孩子年龄等影响。明塞尔以家庭当中夫妻双方劳动力市场行为对彼此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方向。他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剖面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他发现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受到下列因素影响:其配偶平均收入、妇女工资率、妇女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业率以及年龄。其中,妇女就业收入效应可由配偶双方收入回归系数来推导,而妇女就业替代效应则由妇女工资率来推导。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女性就业者收入替代效应是巨大的,同时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在时间序列资料上所产生的差异,即男性工作时间趋于减少而女性工作时间却在增加。

六、供给学派:减税与劳动供给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得西方经济学界挑战凯恩斯主义,并致力于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兴起于这样的背景,它肯定萨伊定律,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自然,供给学派很注重劳动力供给的研究,形成了该学派在这方面的理论。

(一)对古典劳动供给“后弯曲线”的暗示性否定

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劳动供给行为中的替代效应,而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较少考虑。这是为其减税政策主张服务的。税率越高,人们自然就没有为市场部门而工作的积极性;相反,减税(税率降低)则会使劳动供给增加,使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必然性在于,减税之后所导致的实际工资率的提高,不会产生收入效应。在这里,税率指个人所得税率,它的增减可以直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工资率的变化。税率的提高,将使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或用于享受闲暇;同时也会相应地使部分非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甚至转入“地下经济”。

供给学派从基本的劳动供给行为方面对传统的“后弯曲线”作出某种否定,建立该学派在这方面理论基础。

(二)“向上流动”与就业动力

供给学派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淡化处理,表现为随着工资率上升,人们并未普遍的重视闲暇价值而放弃较多劳动供给;另外,供给学派认为随着税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实际工资率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化并不会由此产生。

在供给学派抨击高税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劳动供给、就业与工作努力的同时,依据“向上流动”理论,其潜在含义是指,降低税率,减少福利开支,将会在实际工资率与劳动供给之间始终保持强劲的替代效应;随着工资率逐步提高,人们(特别是穷人)会对“向上流动”充满希望。

基于加倍工作会获得加倍奖赏的信念,人们将会保持积极工作意识,改变高福利社会中怠惰动机而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同样根据“向上流动”理论,供给学派实际上否定“后弯曲线”的存在,无视收入效应存在。他们认为,“后弯曲线”只存在于静态无贫穷与富裕之分、无穷人与富人之分的社会中,只要存在贫富之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健全向上流动机制,那么实际工资率提高将始终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

供给学派对于劳动供给的研究,是为其提出的减税政策服务。在考虑税率变动的的影响时,片面强调对生产的效果,忽视对需求的影响,从而夸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七、理性预期学派:预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在理性预期学派理论中,劳动供给或就业、失业的决定,是一个产品和闲暇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个选择过程。卢卡斯分析到,对于一个面临波动的货币工资和商品价格的 家庭来说,按现时价格在商品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但这只是劳动供给决策的一面;另外还包括在未来物品和闲暇与现在物品和闲暇之间的选择。关于现时劳动供给决策,将依赖于他所预测的最近将来的工资。若现时工资较低被看成是暂时的,他可能接受按此工资所提供的职位。

理性预期学派区别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工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并将预期引入模型,阐明了预期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关键性作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在假定人们知晓真实的经济情况,似乎信息的获取无障碍。然而,即使最好的经济学家也不能总是确切地知道真实的经济情况。在现实中,劳动者很难获取作为预期基础的足够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性预期假设是不现实的。

八、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将视角转向宏观,将经济周期与家庭劳动参与决策联系起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变化如何影响家庭,即夫妻中一方从事劳动市场工作,而另一方进行家庭生产活动。假设发生经济衰退,导致夫妻中就业一方失去工作,则全部参与

率净效应将取决于新增工人效应和气馁工人效应。

新增工人效应是指当主要家庭挣钱者失去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将暂时进入劳动市场,希望找到工作以弥补家庭收入下降。转移方式获得夫妻中就业一方部分劳动收入。从那些从事家庭劳动成员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收入是非劳动收入。

气馁工人效应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某些失业工人对寻找到一份可接受工作感到非常悲观,停止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努力,因而,此人暂时成为非劳动参与者。一般说来,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工人和寻找工作者可得到的实际工资下降,增加收入的“价格”,并降低闲暇价格。这会使有些工人以闲暇替代寻找工作。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工资率降低将会导致许多人退出劳动市场。替代效应表明工人的工资率下降将导致劳动供给积极性下降。

两种效应以相反的方式影响参与率和劳动力规模,至于何种效应占优势,经验研究表明气馁工人效应略占优势。有关劳动规模的周期性变化也可以由某些人参与劳动的时间来解释,如已婚妇女的参与率的变动。

九、家庭内部劳动决策: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且吸收非合作博弈战略性议价理论方法,Ott(1992)给出一个两阶段“离婚威胁”模型。假定家庭进行两次效用分配讨价还价,由于将时间配置到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对人力资本积累将产生上述影响,这个模型威胁点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第一阶段劳动供给内部决定,进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可交易性提高第二阶段威胁点,从而提高他(她)在家庭中谈判地位,实现更高效用分配。所以劳动供给决策在此模型中就是一个战略变量,意味着家庭最优时间配置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还要考虑个人未来谈判能力,内生威胁点使议价理论优势得以真正体现。Ott用模型一阶条件分析家庭中夫妻双方为什么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并指出在最优时间分配条件下,由于议价效应存在,妻子的保留工资下降,从而为更多妇女走向市场劳动作出很好的解释。

将博弈论作为家庭内部决策分析的基点,扩大了分析视野。然而,视夫妻双方博弈为非合作博弈,则使家庭生活也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十、评价与启示

从最早亚当·斯密论述工资变动与劳动供给变化,到结合博弈论分析家庭内部劳动决策,经济学家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由个人扩展到家庭,使理论愈发贴近现实,对出现的劳动参与率变动现象的解释力不断增强。虽然如此,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这些解释劳动供给变动的理论只研究某个方面,而现实中劳动参与率变动是多因素引发的。然而,理论的不尽完善并不削弱其对现实的解释力。这些理论仍有助于分析和解释最近几年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日益提高等现象。

参考文献:

- [1]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 [2] 萨尔·D·霍夫曼.劳动力市场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 [3] 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4] 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 [5] 乔治·吉尔德.财富与贫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6] 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 [7] 尹伯成、华桂宏.供给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 [8] 尼古拉斯·巴尔.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 [9] 吴红梅.雅各布·明瑟劳动经济学思想评述[J].经济动态,2001(4).
- [10] 李平.国家智力资本理论研究现状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3).
- [11] 吴桂英.家庭内部决策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2(2).
- [12] 张凤林.劳动供给行为与就业体制安排的内在关系研究[J].经济学,2002(11).
- [13] 宋湛.劳动者的微观选择行为与劳动供给曲线[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 [14] 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J].经济研究,2005(7).

(责任编辑:弘 流)